

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藐视玄思的时代,如何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与生机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的策略,是一个新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陈平原

谈起“文学”,不管是大学的文学教授,还是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甚至是不以学术为业的人似乎都能谈上几句。在很多人看来,其“专业性”并没有物理学、生物学那样强,可以说是一门“低门槛”的学问,但是,就是这样一门“低门槛”的学问却也有很深的“堂奥”。

文学的定义

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概念在不断演变。《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界定“文学”的: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的总称。常指作者的想象写成的诗和散文,可依作者的意图以及写作的完美程度而区分优劣。在18世纪以前的西方,或者20世纪以前的中国,谈到“文学”不一定涉及此意,今天中国所谓的“文学”其实是19世纪末西方“Literature”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后重新组合起来的。在《汉语大词典》中“文学”一词征引的范围,从孔子到鲁迅,分列十种不同含义。可以指孔门四科之一,儒家学说,文章典籍,儒生,学校,人才等等。

文学作为“学校”解,即习儒之所,词典引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南岸道东,有文学。始文翁为蜀守,立讲堂作石室于南城。”其实,在更早的时代,曹操的《修学令》中“文学”就有“教育”的含义:“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

废,而有以益于天下。”这里说的“各修文学”,当然就是指教育了。设校官,选才俊,认真培育,以使得社会风气改良。

不将文学作为一个“专业”的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清。晚清时的传教士狄考文曾代表在华各国传教士建议组织“文学会”,而所列课程却并没有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而是“专以振兴中国文学为己任”。这里所说的文学,即是广义的文化教育。

1901年,蔡元培出版题为《学堂教科论》的小册子,从教学的角度,对人类知识进行分类。在蔡元培的分科体系中,共设算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名学、群学、文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十科。其中的“文学”,包含音乐学、诗歌学、图学、书法学和小说学五个分支。从“美术”以及“玩物怡情”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可还是稍嫌笼统。1902年,张百熙奉旨复办庚子事变毁坏的大学堂,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此章程将“辞章”列为大学堂的重要课程,是一大变化。1903年张之洞奉旨参与重新修订学堂章程,其“参酌变通”的指导思想,在同时上呈的《学务纲要》中有详细说明,其中一条就是“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之后,中国文学逐渐进入大学课堂,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

文学系不是作家班

古往今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教育,分歧在于对“文学”和“教育”的定义,

以及“文学如何教育”。孔子所言“不学《诗》,无以言”,与当今中国大学里中文系、外文系的“文学理论”或“文学史”课程,不能说毫无关系,但教学宗旨、论述对象以及培养目标等,均有极大差异。“诗教”源远流长,词章诗赋乃所有读书人的共同修养,没必要作为“专业”来经营。偶尔的例外是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以及南朝末帝时的“四馆”。但这样的“异和光”,实在太多了。隋唐以降,除作为读书人正途的国子学以及各级官学外,确实有“专科学校”存在,但开展的是律学、书学、算学、医学乃至武学等方面的“职业教育”。传统中国文学没有作为专业进入到教育体系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重要,而是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只要读书识字就要与文学打交道,所以没必要将文学作为一门专业。

“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与情怀,确实有其特殊性——上大学不一定就能学好;反过来,不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学不好。这一点,与自然科学很不一样,在那里,极少自学成才的例子,没受过高等教育,基本上就“免开尊口”。而不是所有在文学上有突出贡献的人都接受过作为“专业”的文学教育。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的“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

晚清以降的文学教育发生了一个变化,即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

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传承,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现在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大学的文学系不是作家班,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教文学?

从学术史角度,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构建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而声音随风飘散,当初“五彩纷呈”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的,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尽管这些很重要),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

作为文学教授,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藐视玄思的时代,如何为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与生机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的策略,是一个新的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董光壁

我看过许多科学大师的科普演讲集。我聆听过许多中国科学家的科普演讲。我自己也曾多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演讲。好的科普演讲应包含有准确的科学知识、科学的有效方法、科学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的批判精神。科普演讲之艺术在于,紧跟不断前进的科学步伐,结合社会遭遇的科学问题,激发听众潜在的科学兴趣。我的这些体悟无须说理论证,英国皇家学院和法拉第的故事足以证明。

英国皇家学院的科普演讲

英国皇家学院是由伦福德伯爵创建的。伦福德原名本杰明·汤普森,出生在北美殖民地波士顿附近的一个农家。独立战争期间,由于他的“祖国立场”而在英军失利之后逃往欧洲。在英国期间他在乔治塞维尔勋爵的帮助下从事科学,并于1779年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781年在皇家学会的会刊上发表关于火药力的实验报告。

由于想在故乡美国建立军事研究所的计划遭到拒绝,伦福德开始设想一个改善市民生活的开发计划。他成立了一个“鼓励工业发展和谋取穷人福利事业协会”,并在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的鼓励下,在伦敦设立了一个旨在向一般公众进行科学教育的机构——英国皇家学院。

英国皇家学院的宗旨是,通过对新发明和改良的公开实验和演讲,传播应用科学知识。皇家学院的第一位教授是皇家学会会员、格拉斯哥医生托马斯·杨,他在这里讲授自然哲学两年,提供91个演讲,后来汇集为《自然哲学和机械工艺教程》一书出版,并且在汉期间成功地完成了光的干涉实验。但伦福德更看重另一位演讲人汉弗莱·戴维。

戴维出生在康沃尔郡彭赞斯一个贫穷的木匠家庭,20岁学徒期满成为一个医学研究所的药剂师。23岁的戴维被伦福德选中成为皇家学院的讲师,由于他的演讲才能和热运动理论的学术观点,很快被伦福德提升为教授。由于向公众介绍他的发明并展示它的实物这一宗旨受到来自詹姆斯·瓦特等发明家的反对,伦福德对这种违背他的初衷的压力极为不满而于1804年去了法国,戴维接替伦福德主持了这个学院的全面工作。

戴维接替伦福德时的皇家学院正陷入经济困境,因为研究院的经费主要靠捐助,他就有意使演讲迎合富翁们的需要。同时他还接受了农业部 and 矿井防暴协会等机构的委托研究,这不仅使学院得以正常运转,而且从单纯的教学模式日渐转向教学与专业研究结合的方向。1829年还是中年的戴维逝世于瑞士。他在遗嘱中留下一笔奖励青年化学家的基金,因而有了英国皇家学会的戴维奖。

戴维对科普演讲非常认真,勾斟字酌地精心准备。他英俊自信而又富有魅力,他的演讲娓娓动听,连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也常以听他的化学演讲为消遣。某些科学史家认为,他是天生的招徕大师,最有风度的伟大科学家。他因皇家学院的演讲而出名,甚至掩盖了他在科学发现方面的贡献。然而他最伟大的发现被公认是发现了伟大的天才迈克尔·法拉第。

科普演讲成就了法拉第

法拉第出生在伦敦近郊的一个铁匠家庭,5岁全家迁居伦敦。他只念了几所小学,13岁到一家书店当学徒,与书的接触激发了他对科学的热爱。从1810年开始他参加科学家和哲学家约翰·塔特姆创建的城市学会的活动,在半年时间里听了塔特姆的十次自然哲学演讲。书店的一位顾客送给他一张皇家学院的听课票,因而得以在1812年春天聆听戴维的第四次化学演讲,并且这还成为他进入皇家学院的一个机缘。

1812年秋天,21岁的法拉第学徒期满,被推荐给戴维做临时记录员。他把自己的听课笔记精心装订成《戴维演讲录》,并把它送给了戴维以表明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愿望。1815年他开始在戴维指导下从事化学研究,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科学生涯。

由于科学贡献,许多荣誉和利益接踵来到法拉第身边,1824年他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829年获皇家学会科普奖,但他拒绝了女王的封爵、墨尔本公爵提供的年薪、威灵顿公爵高薪职位建议和为战争制造毒气的研究。科学和财富不可兼得,他选择了科学,并保卫科学的尊严。他宁肯以100英镑的年薪专注于研究,而拒绝年收入5000英镑的商业服务。永远保持一个普通人心态的法拉第,遗嘱要求葬在“最普通的墓碑”下,只刻有姓名和生卒年月日。

法拉第成就了皇家学院

在戴维引退之后法拉第继承和发展了学院的传统,他通过建立物理实验室进一步完善了学院的研究条件,他也使面向一般公众的科学讲座更加丰富多彩。

法拉第邀请百余位科学家和艺术家参加各种系列的科学演讲,著名的星期五晚间演讲,针对学生的少年讲座、高水平的圣诞节演讲和智力教育观察报告,吸引了在身份、年龄和知识方面不同的听众。

法拉第不仅组织了这些演讲并且亲自演讲百余次,其中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两次演讲。一次在1831年的一天,因演讲人查理斯·惠斯通不能来,法拉第临时顶替作了一次即席演讲,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他把一个磁铁棒插进接有电流计的线圈,既对自己也对观众演示他有关磁力线的假说。另一次在圣诞节演讲会上,他发表了题为《蜡烛的化学史》的演讲。我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他最有名的演讲集《蜡烛的故事》,就是以这篇不朽的杰作为书名的。

法拉第有卓越的演讲技巧,连颇善长演讲的小说家查理斯·约翰·赫芬姆·狄克斯都佩服他。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和儿子阿尔伯特·爱德华都是他的听众,英国威尔士亲王和法国奥尔良公爵斐迪南·腓力也被吸引来听他讲能发电的莱顿瓶。

法拉第是一位富有鼓动性的老师,他的演讲曾吸引年轻的皇家学会会员和皇家学院化学教授约翰·弗里德里克·丹尼尔走上电化学的研究方向,并为改进化学电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威廉·珀金受法拉第演讲之鼓舞犹如法拉第受戴维演讲影响之大,作为中学生的珀金听了法拉第演讲而迷上了化学。后珀金就学于德国化学家奥古斯特·威廉·冯·霍夫曼而成为一名化学家,他合成了染料并创办一座染料厂。珀金23岁就成为染料化学权威,连他的启蒙老师法拉第都去听他在伦敦化学会的演讲,50岁又荣获皇家学会的戴维奖。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科学演讲的魅力

董光壁

绝对不能因发生地震灾害,而随意地变更权利义务关系,更不能在法律之外,对不可抗力作出扩大解释,从而产生更大的混乱。



乔新生

解决地震债务问题必须依法办事

乔新生

疑问属于不可抗力,但是,这种地震灾害不可能导致合同的解除,也不可能导致住房贷款的免除。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所谓住房贷款合同是指商品房购买人向银行贷款,并且把房屋抵押给银行的行为。假如购买人自筹资金购买商品房,那么,只要办理了过户手续,房屋倒塌之后,所有的风险都应该由购房者承担;换句话说,即使购买人向亲朋好友借钱,向开发商购买住房,那么,只要办理了商品房交付手续,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风险由购买人自己来承担。反过来,如果尚未办理交付手续,那么,发生地震灾害房屋倒塌之后,所有的风险都应该由开发商来承担。换句话说,开发商应当向购买人提供住房;或者,依照不可抗力的原则要求解除合同,退回所有的房款。

不可抗力不适用于住房贷款的情形。假如是向银行贷款,由银行向开发商支付购房款,那么,购买人与开发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

结束,购买人必须向银行按期偿还贷款。银行之所以愿意向开发商支付房款,是因为购买人愿意将自己购买的住房作为担保,并按期偿还购房款。银行与购买人之间的合同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借款合同。购买人提前向银行支取了购房款,银行答应购买人分期付款,前提条件是购买人必须将自己的房屋抵押。假如购买人购买的商品房在地震中倒塌,那么,购买人必须提供其他的抵押物或者重新与银行协商签订偿还协议。不能因为商品房在地震中倒塌,而免除购买人偿还贷款的义务。

从法律上来说,借款合同是主合同,而住房抵押合同是从合同。借款合同权利义务不能因为担保物不存在而发生变化,除非当事人协商重新达成协议。当然,如果购买人在地震中失去了住房变得一无所有,那么,银行要想行使自己的权利要求购买人继续履行债务,显然已经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银行可以考虑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进行呆账处理,当地政府也可以积极帮助银行解决合同履行中存在的问题。绝对不能因发生地震灾害,而随意地变更权利义务关系,更不能在法律之外,对不可抗力作出扩大解释,从而产生更大的混乱。

部分法律工作者认为,依照公平的原则应当免除购房人偿还贷款的义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这种观点之所以荒唐,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意识到社会公平正义是建立在个体正义基础之上的。如果不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随意地改变彼此的權利和义务,那么,社会的稳定就不复存在,法律的秩序就会遭到破坏。所以,法律工作者千万不要混淆视听,发表一些缺乏法律常识的言论。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

要改变过去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建立由各“地缘重心国”组成的大国协调体制,从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战略稳定格局,世界才能稳定、和平与发展。



苏洁

中国地缘逻辑及其地位

苏洁

设施建设,如国家高速公路、铁路、电力走向的规划与建设,犹如河流的功能一样,基于特定的地缘环境,决定着物流与人流的走向。这种地缘逻辑决定了中国的大陆国家的特质,也是中国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追求的客观基础。然而,近代以来的东西方碰撞的历史告诉我们,仅靠东亚大陆并不能维持中国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忽视中国所拥有的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

中国东、中、西三部分的关系可描述如下:西部决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要有一个稳定的西部屏障,一定要保证新疆和西藏的安全。清末左宗棠主张塞防海防兼顾,就是看到了西部的重要性。为了巩固西藏,国家开通了青藏铁路。有了西部屏障的保护,才能安全和稳定。据此,我们可以对国家的“三步走”战略作出新的解析:第一步,改革开放,首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问题;第二步,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将决定中国的富裕问题;第三步,解决富裕问题之后,我们最终要走向海洋——东部海洋决定中国的强大。东部、西部、海洋,构成我们的三步走战略脉络。西部决定中国的生存,东部决定中国的发展,海洋决定中国繁荣富强的未来。

国家建构历程

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地处中国西北部的“零地带”的功能。《史记》中司马迁有这样的论断:中国自古以来的历史嬗变是“起事于东南,而成功于西北”。秦始皇

一统天下,秦国的根基在关中;汉高祖刘邦起兵先占咸阳,“先占关中者王”。唐代李渊父子晋阳起兵而闯大唐盛世,明成祖迁都北京巩固明朝基业,李鸿章占据陕北高洛山终能推翻大明江山,左宗棠坚持“海防”“塞防”兼顾才能够收复新疆;毛泽东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转移到延安,最终推翻“蒋家王朝”而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中国政府感到不进行“西部大开发”就无法使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大西北”是中国历史的动力源,其蕴藏着的巨大势能潜在地决定着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将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崛起。

地缘重心决定国际地位

中国西部屏障的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世界屋脊”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的形象概念,还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的内涵。保障中国内在地缘重心的“零地带”的安全,中国需要保有和控制作为西部屏障的青藏高原,由此而决定了中国占有“世界屋脊”的战略制高点,因而获得亚洲大陆的地缘优势。这对于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政治的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地缘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的“地缘重心国”,因而能够在东亚,乃至亚洲国际关系中居于一种决定性的地位。这里提出的“地缘重心国”的概念,是指居于地缘板块相对居于几何中心位置,并具有地缘战略优势的大国,对其地缘板块内的周边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决定着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这样的国家就是地缘重心国。

地缘重心国是地缘板块内的政治活动中心,安全上起着和平稳定的支柱作用,经济上对地区经济发展发挥引擎作用,文化上影响地区人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板块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推动作用。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并积极设定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现在已经有“10+3”的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机制。尽管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就是想撕裂和解除东亚,但是东亚的地缘逻辑决定东亚最后一定会整合。上世纪90年代日本通过产业分工、对外投资、经济合作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羊,从而形成一种“雁行模式”。但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已发生转型,即形成了一种“平轴模式”。通过产业分工、投资流向、劳动动力流动、知识产权共享,使整个东亚成为一个内在循环的经济共同体。因此有这样一种现象:made in China 其实是 made in East Asia,虽然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很多零部件在东亚各国生产,在中国组装。东亚事实上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车间。

除中国外,美国是北美的地缘重心国,巴西是南美的地缘重心国,德国和法国是欧洲的地缘重心国,非洲则是尼日利亚。在地缘重心国之间把握平衡,就能更好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些大国之间需要一个协调机制,这样国际关系才能稳定。要改变过去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建立由各“地缘重心国”组成的所谓大国协调体制,从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战略稳定格局,世界才能稳定、和平与发展。

(作者系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